



李友芳： 一个值得镇江人 记住的名字

□ 田海虹

镇江有着悠久的历史,出现过无数的名人名家。其中有这么一位,为镇江现当代的民族工业和社会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就是李友芳。

力挽狂澜救恒顺

提起镇江,大家经常用一句非常流行的广告语来描述:一个美得让你吃醋的城市。这里的“醋”,就是“镇江三怪”之一的镇江香醋。镇江香醋之所以驰名海内外,则主要来自江苏恒顺集团有限公司在香醋酿造上的成就。

江苏恒顺集团最早创建于1840年,在180多年的发展历程上多有跌宕起伏。李友芳,1946年至1955年主持恒顺工作,被认为是李氏恒顺的第二代掌门人。

当时,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镇江也终于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但是各行各业可谓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恒顺更是被国民党地方政府列入要封门的厂,“绥靖公署”甚至派人到恒顺搬走了100余件家具。在那生死攸关之际,刚刚接手恒顺的李友芳,动用了大量的人脉,通过多种渠道最终化解了恒顺被封门倒闭的危机。他又利用自己在金融界的社会影响力多方筹措资金,经过不懈的努力,李友芳终于帮助恒顺渡过了那个灾难深重的时期。他不仅保住了恒顺,也保住了一百多名职工的饭碗和几百名家属的生计来源,更保住了这一发源于镇江的珍贵的民族工业品牌。

为了重新振兴恒顺,李友芳高度重视产品质量。为了提高工人师傅的工作积极性和稳定性,他亲自定下一条规矩:不管哪一天,只要醋的质量好,产量高,就通知厨房买肉犒赏工人师傅。这在当时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被传为美谈。同时,李友芳还非常崇尚技术创新。他买了许多相关的专业书籍进行理论学习,亲自到车间和一线工人师傅一起讨论和实验。每次实验他都做好配方和检测效果的记录,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意见。通过无数次尝试,李友芳终于研制出最佳配方,即以千斤大米搭配1400斤麸皮,不但每月可节省主粮600公斤,还可多产醋700多公斤,醋的品质也较之前更好。

多管齐下的措施使恒顺很快恢复了元气,走上良性发展道路,并逐步成为引领酱醋行业的翘楚。

大爱大义沧桑路

其实在正式掌管恒顺之前,李友芳就已经为恒顺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抗战期间,李友芳与其父把上海恒顺分店作为大本营,在此期间通过多种关系,先后到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等国家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并从这些国家和地区绕道西南大后方,维护客户关系,拓展业务。他这种巩固老客户、建立新客源的方法,为日后恒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李友芳还是一位具有爱国精神的民族资本家。他曾利用参议员这一公开身份,筹集资金购买了600担大米,还有通过各种渠道买来盘西林等解放区急需药品,冒着巨大的风险分批送到了苏北解放区,支持革命事业。

不仅如此,李友芳也是一位光荣的烈士,他的两位爱子分别献身于解放战争和和平时期的海军建设事业。在白色恐怖时期,他的长子李光耀与一批有志青年冲破千难万险,奔赴中国革命圣地延安。1948年10月,李光耀在解放太原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以身殉国,时年25周岁。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李友芳的四子李光辉报名参加参军,于1951年1月随部队赴朝参战,凯旋回国后被送到海军基地海测培训班学习海测技术,1956年被分配到东海舰队海测大队担任测量员。1960年12月6日,李光辉带着两名战士划着橡皮艇到舟山附近的沿海进行测绘时,橡皮艇在暗礁上搁浅,为救战友,李光耀光荣牺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记三等功。那一年,李光耀年仅29周岁。当时的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大将得知消息后悲痛地说:“李光耀是海军和平建设时期牺牲的第一人。”

邮情无价有“芳”名

除了在振兴民族工业和支持革命事业上的建树,李友芳也是我国早期著名的邮票收藏家。他集邮时间早,收藏邮票品质高,数量多,在国内屈指可数。

在李友芳先生收藏的众多藏品中,很多都是稀世奇珍。如我国的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就是邮票印制前打印出的样品,仅供验审、存档、备案用,流传极少,无比珍贵。还有一些特别发行的邮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1959年)、“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196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1965年)和“革命现代舞蹈——白毛女”(1973年)等,这些藏品从不同层面反映出我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时代特色和变化,不仅为专业集邮者提供了富有价值的研究范本,也为不懂集邮的普通民众提供了欣赏学习的宝库。

为数不少的实寄封也是李友芳先生藏品中极具研究价值的部分。实寄封记录了比邮票更多的资料,对于研究邮政史和邮票史、印证有关事项的史实,有着重要的作用,是集邮收藏、研究的重要对象,是制作邮政史邮集、传统邮集和专题邮集的重要藏品。

李友芳先生经历了硝烟四起的战争年代和风云动荡的“文革”时期,这些宝贵的藏品能够留存下来,也足见他对集邮爱好的极大兴趣和缜密严谨的行事作风。欣赏他慷慨捐赠的精美邮品,仿佛将自己置身于中国近现代发展的缩影版,精致而曲折,又仿佛看到了他为民族工业走南闯北、殚精竭虑而风尘仆仆的样子。



陈景福与萧楚女的革命交往

——兼记陈景福烈士在镇江的活动

□ 孟宪成



萧楚女写给陈景福的明信片

1924年11月2日,镇江市立第六中学体育教师陈景福愤慨于时政的腐败和不平的现实,奋笔疾书,给身在上海的好友萧楚女写了一封书信,倾诉自己的苦闷。

陈景福,号震寰,江苏常熟人。1920年毕业于上海东亚体育学校。1921年秋,赴安徽宣城省立第四师范任体育教员,由此结识同在此处任教的革命先驱者恽代英和萧楚女。萧楚女在讲授国文课时,借古论今,经常向学生宣传“中国只有革命,才能富强起来”的道理。由于他学识渊博,讲课生动,在学生中享有极高的威信。陈景福对萧楚女十分钦佩,志同道合,遂成莫逆。他与萧楚女等人一起,发动学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并支持学生与反动学监进行斗争。后遭到安徽反动当局下令逮捕,萧楚女离开宣城,陈景福也随后离去。

1922年秋,陈景福前往重庆,担任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事务主任,并兼重庆县立联合中学卫生部主任及体育教员。在重庆联合中学,他再度与萧楚女共事,并在其带领下,将重庆联合中学作为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1922年11月,为解决失业失学青年的就读问题,陈景福协助萧楚女开办以“选土育才”为宗旨的重庆公学,公学学生免费入学,教师们自愿不拿薪俸。

后来重庆公学被反动当局视为异端,最终遭到解散。此后,陈景福先后在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及四川第二女子师范与萧楚女共事。在此期间,陈景福由萧楚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受到反动势力的迫害,陈景福于1924年春离川返苏。同年下半年,由原重庆联合中学同事、镇

江省立第六中学训育主任杨效春介绍,受聘于镇江市立第六中学任体育部主任。

初到镇江的陈景福人生地疏,再加上自身的遭遇,他一方面郁闷于现状,一方面急切施展个人抱负,在给萧楚女的信中,他对自己的革命引路人直抒胸臆,诉说自己“很想丢此无味之事,寻一较有益于社会的事做”,要求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挽救国家的危局。

此时的萧楚女公开身份是重庆《新蜀报》主笔,而在党内,他的任务是协助恽代英编辑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并已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特派员一职,即将赴川渝领导和整顿地方青年团组织。收到陈景福11月2日来信后,百忙之中的萧楚女很快于11月9日予以复信,复信用明信片写成,工整的毛笔字写满两面,足见他对回信的重视与认真。信中,萧楚女对社会状况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指出社会的不平“根本由于外国资本的压迫”“要除反动,根本要消灭军阀;要除军阀,根本要打倒外国资本势力”。萧楚女并向陈景福指明了宣传和发动群众的步骤和方法,至于如何宣传、发动、组织群众,建议陈景福订《中国青年》,学习开展工作的方法。全文情真意切,循循善诱,展现了萧楚女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精辟的见解以及对

陈景福殷切的期望。

1980年10月,萧楚女致陈景福的这张明信片被陈景福之子陈大平在整理家中旧物时发现。这件淹没50多年的珍贵革命历史文物为世人所悉,成为萧、陈两位烈士革命交往的历史见证,也成为教育后人的生动教材。

萧楚女的复信给陈景福以极大的鼓舞,也使他明确了斗争的方向。陈景福立即动身去上海找组织研究组建国民党的事宜,同时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1924年底,陈景福联系杨植之、陈斯白、柳健和黄始鸿等人,建立中国国民党镇江小组,并于次年5月组建镇江第一个国民党党区分部。

与此同时,陈景福注重在青年中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成立小图书馆,买来《向导》《中国青年》等革命杂志,鼓励青年阅读。并进并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于1925年6月初成立“青年励进会”。1925年秋,上级团组织派中共党员曹壮父到镇江,筹建共青团组织。在陈景福的联络下,以镇江市立第九师范学生为骨干,成立镇江共青团特别支部。支部与上级联系事宜仍由陈景福负责。

1925年3月至1926年5月间,陈景福在镇江曾7次向团中央写信作书面报告。信中多次表示:“景福自与兄认识后,无日无时不以兄之言,做吾之工作指导者。”“一息尚存,吾决不愿为革命之落伍者。”……表达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同时,他始终惦念着远方的萧楚女,数番提请团中央向萧楚女转致问候或打听萧的下落。在1926年3月5日的报告中,陈景福在末尾写道:“楚女往广州办刊物,不知他的通信处何在?请见告,即请。”牵挂之情,文字间跃然可见。

1926年6月萧楚女到达广州。到广州时,正逢由毛泽东任所长的第六届农民讲习所开学不久,而萧楚女即在该所代理教务主任工作。陈景福随即进入第六届农民讲习所学习。

两张奖状引出的故事

□ 嵇钧生

最近在翻找资料时,找出两张纸质泛黄,与省镇中相关的陈旧奖状,算算时间已过去73年了。不由引起我对少年时代进入中学前后的一段学习生活生活的回忆。

我小学阶段是上世纪40年代,镇江正处于日寇占领的沦陷时期。百姓生活水平普遍低下。我家由于父亲早逝,母亲靠种田、摆小摊、些许的房租收入,独自领着5个幼子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生活极端贫困,常常是饱一顿,饥一顿。我上学只能时断时续,交不起学费就上,交不起就不上。在小学四年级以前,我上过校址在城西西顺局巷(后改名生产巷)原冬顺局内,与我家仅一墙之隔的安怀小学。我也曾在跟随母亲回扬州农村老家种田时短住过上过乡小小学。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回到镇江市上穆源小学,插班四年级,直到1949年毕业。

那时虽然已经抗战胜利,但由于日本强盗长年统治压榨,抗战胜利后又内战不断,一般民众普遍生活贫困,老师工作不稳定,说不定上学期还在教学,下学期就不被聘用而失业了。学生失学更是家常便饭,常常是上学期一班有30来个同学,下学期就不足20人了。许多同学在读完“初小”,即读到四年级后,就无力继续读“高小”,即读到六年级。从此不得不失学走上社会,学徒打工,提篮小卖,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穆源小学是由热心教育事业的回族人士创办,面向回民大众,带有义务性质的一所小学。许多回民子弟来此求学,贫穷的还可以申请减免费用。学校也兼收非回民学生。因此虽然我不是回民,但当时校董杨公崖先生了解我的家庭情况后,仍然爽快地接受我入学。

穆源原是一所名校。但早在抗战初期,学校漂亮的教学楼就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毁了。抗战胜利复校后一度暂设在城西山巷清真寺里,教室是借用了礼拜大厅对面的几间屋子。后来才搬到杨家井

址残存的瓦破屋漏、四墙透风的老平房里。我之所以上穆源,是听说当时的穆源不但学费比较低,还有一个很好的奖励制度。即年级第一名可以免交学费,杂费和书本费,也就是一切费用全免。第二名可以免交学费和杂费,自己负责书费;第三名就只免学费了。因此我必须努力学习,力争得到第一名,以争取到全免,才能继续上学。从现在保留的小学奖状来看,我在五年级和六年级都获得了第一名,总算没有了欠交学费的窘困。

也许有件事值得一提。大概是1948年,镇江一家地方报纸(报纸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清楚地记得报社社址在京畿路与伯先路和宝盖路的丁字路口处),举办了一个读者奖学金的活动,我也申请了。记者到学校和家调查,了解了我的学习情况和家庭情况后,给了最高的奖学金,当时还发了报纸。我现在已记不得具体钱数,但记得比学校的免费金额还多。由于当时学校的经济状况也不好,我便主动放弃了那个学期的免费资格,自己交了学杂费,得到了学校的好评。

这样我终于得以“高小”毕业,获得了穆源小学颁发的“高级修业期满成绩及格”的小学毕业证书。

现在的孩子享受着国家九年义务教育,大概不会知道过去小学竟然还有四年“初小”和六年“高小”之分。还要为费用发愁,然而这张小学毕业证书正是当时社会贫困、教育水平低下的历史见证。

“高小”毕业了,有人也不再继续上学了。但我的母亲认为,我们家既无钱也无势,要想立足社会得以生存,必须要有一定的知识,因此主张再困难也要想办法继续上学。这就面临上哪个学校的问题。

正好这时看到了江苏省立镇江中学“暑期师生服务团”举办暑期补习班的布告。于是我就报名了。

这种补习班多是义务性质的公益活动,只收极少的讲义费。补习班的老师多



为高中学生,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但印象中,在老师带领下,这些同学都很认真负责。

因为我一心想继续上学,所以学习很用心。补习班结束考试时,我获得了好几张奖状。现在还保存的两张,一张是“暑期各科测试比赛”成绩优秀奖状。另一张是“政常(政治常识)比赛”成绩优秀奖状。这些奖状很简陋,是手写在蜡纸上油印的。奖状上的五角星用水彩涂成了红色。“奖状”二字也是用水彩上色的。第一名涂成红色,第二名涂成黄色,第三名涂成蓝色。记忆中我还有几张单科的奖状,但一时找不到了。不过各科综合第一名的成绩说明我的单科成绩也是比较好的。

不久中学招生考试,我同时报考了省镇中和市一初中,两所学校都录取了。我原来是一心想上省镇中的,但因为省镇中在远郊的七里甸,离家远,每天要走太远路,妈妈不放心。而住宿花费大,经济上承受不了。当时我家已搬到宝塔路福安里。于是决定上离家比较近,在山门口街的市一初中。

这样我就在市一初中上了一年级上学期。不料到下学期,我申请减免学费未获批准。当时家中已是三餐难以继,妈妈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我只好失学在家了。

那时新华书店在大西路,于是我几乎天天泡在书店里,翻看各种书籍,甚至有

1926年底,陈景福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政治部组织科长,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随着形势的日益紧张,陈景福被迫离开部队,回到家乡常熟,并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

1929年初,陈景福应好友陈斯白之召,再次来到镇江。先后担任镇江市第一区党部执行委员,县党部递补执行委员、执行委员。陈景福开始仅是应付差事,到后来干脆很少去上班。1930年1月,国民党江苏省党务整理委员会以“迹近反动,久离职守”为由,将他撤职。此后,陈景福辗转于镇江的省会救济院游艺习艺所、体育场、中心民校等处工作。1935年12月,常熟一批进步青年因组织读书会及参加学生论坛被捕,被押往镇江监狱监禁。陈景福多方设法营救他们,并亲自作保,将被捕青年保释出狱。

1937年春,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国民党江苏省政府通令各县成立民众训练委员会和壮丁训练总队,陈景福担任专职的镇江壮丁训练总队副队长,并兼任第一区(即城区)民众学校校长和壮丁训练大队副,具体负责壮丁训练工作。陈景福在民众学校上课时,总是反复围绕“国难当头,奋身卫国”的宗旨慷慨陈词,而军训时则认真操练,一丝不苟。

“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镇江壮丁训练总队负责构筑了许多防御工事,简易防空壕等;根据前方战事的需要,派遣民工夫役支援前线;参与接待过境外战部队、接运伤病兵员,维持社会秩序、查防汉奸,为地方抗战作出了很大贡献。而陈景福于其中的训练之功劳不可没。

1937年12月,陈景福回到家乡组织抗日武装,后编入党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第三支队,他本人出任第二路副司令员。1939年10月,江南抗日义勇军主力西撤杨中,陈景福留在地方坚持斗争。1941年秋,日伪对苏常太地区进行大规模清乡,陈景福不幸落入敌手,惨遭杀害,时年46岁。